

## ■ 大视野

# 长期因素未变 经济下行趋势难言终结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2012年9月、10月经济数据公布后，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四季度将触底。的确，PMI、工业增速、工业利润、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都出现一定反弹，这些都是判断经济向好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触底，9月的反弹是暂时的，只表现了经济在下行趋势中的波动。理由是因为观察短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短期视角，更需要长期视角。

## 观察经济增长要有长期视角

长期视角就是看决定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短期变量是指货币、利率、财政收支和物价水平这些宏观变量；长期变量则是指收入分配、城乡人口比例等结构因素，提供主要国际需求国家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制度变化。短期因素是快变量，如银根可以马上放松或收紧，但长期因素变化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但根本改变一个社会制度需要长时间酝酿。所以，长期因素决定长期经济趋势，至少是长达5年的中期趋势，不会因短期因素变化而立即改变。或者说，短期因素不能改变趋势，而只能改变扩张与收缩的幅度。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判断就不会因年度数据好一点就立即乐观，差一点就立即悲观。

比如，分配关系是决定储蓄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因素，因为它是制度性因素，是由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收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也转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料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大的变革是起于1997年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带来了微观经济的高效率，也奠定了中国真正转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中国取得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进入新千年以后的这十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的消费比率就增加到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其实，净出口也是储蓄或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是以外汇形式被储蓄起来了。

影响分配关系的还有发展方面的长期原因，即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重工业，不得不实行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



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后仍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滞后由长达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所致。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

还有出口问题。如果国内的长期因素都倾向于储蓄，而储蓄的实物形态是过剩产品，则出口就是消化过剩产品的唯一途径。如果国内过剩产品增长快，出口增速也快，国内的实物产品过剩就不会出现。因为对企业来说，商品已经实现了价值和利润，是以外汇形态储蓄起来，企业就具有为出口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分配矛盾，也会被出口的繁荣掩盖。反之，出口速度慢于国内储蓄或过剩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由于爆发国际经济危机而发生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难以避免。

再来看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决定供给，利润决定生产，而最终需求只产生于消费和出口。如果国内消费和国外需求不增长，企业没有钱可赚，就不会生产，更不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增加投资。投资虽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终点是供给，是产能。但投资是一个实物生产场所的建造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一

不好而被中途放弃，因为这等于让企业扔掉已经投进去的钱。所以，市场需求可能已经萎缩，但投资建设产能还在增长，这就是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机理。如果政府为了制止市场需求萎缩而把刺激投资当成扩张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没有在扩大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采取重大举措，那么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长期却使过剩矛盾更为严重。

## 经济下行长期因素没有改变

以上已经说明了理论，现在看看中国的现实问题。

消费需求方面，虽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去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升，但从2011年到2012年，分配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利于消费较快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前两年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还有农民工工资上升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这是短缺造成的市场调整效应，是市场根据生产部门间的要素余缺，通过价格机制重新分配资源，而不是主动改变制度带来的分配关系改善。从今年9月出版的《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看，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是发达国家的1/10，发达国家的实物产品供给远低于需求的矛盾仍会长期存在，并由实物产品供求的长期失衡，决定他们的贸易失衡、财政失衡以及资产负债表失衡都难以纠正。QE（量化宽松）解决不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竞争力问题，只能是一碗“续命汤”，并且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危机。更大的国际危机也许会爆发得很快，因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日本也面临明年初的“财政悬崖”。如果是这样，我国外需就会面临持续萎缩的情况。实际上，今年9月的出口增速反弹主要是基数因素所致。10月出口持续反弹，仍是源自去年出口基数持续下降的影响。

投资方面，今年以来投资增速虽然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但我一直认为，不能用投资完成额来代表投资需求，因为投资完成额更接近投资从需求到供给变化的“质变点”。投资完成额越高，说明马上会变成产能的投资越多，所以把它理解成是产能的增长指标会更合适。比较合适的投资需求的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指标，但这个指标今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16%，比去年同期19.8%的增长率低得多，也显著低于同期20.7%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所以，投资需求还是向下滑，而且也没有理由不向下滑，因为消费和出口需求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只说明了未来的产能过剩会更严重。

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刚刚发布的调查数据说明，2012年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为72.7%，而2010年是78.3%。根据国际统计经验，设备利用率在75%以下就是危机状态。其中有些严重过剩的部门，如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设备利用率分别只有68.8%、67.6%和66.6%，已经低于70%，按国际标准则已陷入严重萧条。但前10个月汽车产业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达33.7%，钢铁也有3.9%，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达23.1%。许多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部门，虽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亏损不断增加，但产量仍高增长。例如，今年10月钢材产量增长11.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4%，原因就是新产能不断加入进来。同时说明，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更多反映着产能的高增长，而不是投资需求的高增长。

生产过剩就是需求不足，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内外需求的增加，投资完成额增速处在高位，就会加剧过剩，企业利润还会继续下降，企业就不会增加生产和投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9月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回升都有假象，因为与企业利润高度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速从8月的-5%扩大到-11%。一般来说，财政数据都比统计数据更可信。而财政收入的反弹主要是因为非税收入高增长。

所以，由于决定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不会结束。目前的经济反弹，更多反映的是政府增加投资和贷款供给的效果，对经济来说仍是外生因素，而不是内生性需求增长。如果没有城镇化具体举措和调整分配关系根本措施的出台，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时刻就不可能到来。我以前认为，经济下行会在2013年下半年结束，也是基于那个时候会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的判断。

## 我国外贸国际市场份额或微升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研究所所长 李健

是新能源产品成为全球贸易保护的受害者。

## 进口增速有望维持低速增长

总体来看，尽管未来出口增长仍将面临较大压力，但进口增速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格局，预计全年外贸占全球贸易的份额有望保持稳定或微幅上升。

## 国内经济有望企稳向好

首先，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今年10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9月48.9%升至49.2%，连续5个月低于50%，显示全球制造业仍处于萎缩区域。但美国和新兴制造业有所改善，美国制造业PMI已连续两个月反弹并位于荣枯线上。主要新兴经济体PMI指数环比均回升。欧元区PMI继续走低，已连续15个月低于50%，继续拖累全球制造业复苏。日本PMI连续第5个月低于50%。

从美国经济来看，美国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1.3%和2%，10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1万人，高于预期的12.5万人，失业率小幅反弹至7.9%。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今年9月的68.4升至10月的72.2，为2008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9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15亿美元，较8月的438亿美元下降5.1%，创2010年12月以来新低。然而，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存隐患。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多持续增长，但周期性、结构性矛盾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的影响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

第二，国内经济有望企稳向好。国内投资和工业增速连续两个月反弹。今年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7%，创7个月新高，增速比1-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7%，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8%，环比上涨0.2%，为5个月来首次环比上升。10月制造业PMI从9月的49.8%升至50.2%，为7月以来首次升至荣枯线上。随着政策效果在第四季度逐渐显现，经济有望进一步向好。

第三，贸易摩擦向新兴产业渗透。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前三季度，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55起，同比增长38%，涉案金额243亿美元。贸易摩擦的领域逐步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扩展，尤其

## 被忽视的增长乘数

□阿肖卡·莫迪

世界贸易乘数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增长减速如此普遍、持久。当一国经济增长放缓时，该国进口会有所减少，从而影响出口国的增长率，并导致这些国家也减少进口。

以欧元区为例，欧元区各国彼此之间和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十分活跃，这些国家的减速导致全球经济总量大幅下滑，反过来抑制了全球增长。随着欧洲从东亚国家进口量的下降，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比去年和2010年的预测值低得多，不难预测，它们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势头也大大减弱了。

全球贸易在稳步萎靡，过去6个月以来几无增长。增长预测中曾经的流行概念——出口将成为“逃生通道”——已不再可信。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随着经济的增长停滞，贸易伙伴下降的进口需求导致经济不景气的蔓延和深化。

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在德国最为明显。该国并没有家庭和企业负债过多的负担，财政状况也很健康，为了走出危机，德国利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贸易对手国经济增长放缓，德国GDP预测值也被腰斩，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在好光景时，一国增长带来的贸易效应能够提振全球增长。但是，在危机时，会出现相反的贸易效应。随着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乘数也在扩大。

事实上，贸易溢出深远地影响着全球增长前景，只不过没有金融传染病那样显著和严重。预测中的明年全球贸易增长很可能不会发生。相反，各国政策错误和拖延或将严重破坏全球经济。

（阿肖卡·莫迪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

# 经济高质量发展比规模增长更有意义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张茉楠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日发布的《展望2060：长期增长的全球经济》报告称，如果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12年超过欧元区，并将于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到2060年，中国GDP将占全球的28%。对于这份报告，中国到底该如何看待“五年超美”这顶高帽呢？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中国正由国际体系外进入内核，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20%，高于美国，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是到达惊人的5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

事实上，去年IMF曾作出过相同的预测：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2016年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预测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6年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至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美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滑落至17.7%。

所谓购买力平价（PPP），是指两种或多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的价格比率，也即测算出两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为国际元（CU），它是以美元为基础，即1美元在美

国的购买力为参考基数，也就是说1国际元相当于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其他国家与美元购买力进行比较。比如，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11年底，美国的GDP是15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1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相差无几，但如果根据实际汇率核算，中国2011年实际GDP为7.3万亿美元，显然按照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的两种算法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前者显然存在明显“高估”的倾向。

其实，“高估”的背后除了对中国超预期增长速度和活力的惊

叹外，更多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近几年，与“中国崩溃论”相对的“中国赶超论”、“中国独秀论”也不绝于耳，这些论调背后都遵循着一条主线——夸大的中国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崛起保持戒备。对此，我们应怀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去鉴别和对待。

近两年，从顺差责任到汇率责任，再到碳排放责任，西方开始频频抛出了“中国责任论”。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买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包围。

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

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必须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认识。从整个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全球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的结论，一时经济总量的变化，改变不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中国的大国责任与角色定位，应该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经济社会中仍有诸多失衡因素，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十分之一，资源匮乏、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社会发展仍处于现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业有待发展和完善，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这些问题都决定了中国还将经历巨大的成长考验。

从全球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尽管我们已经在调结构方面开始起步，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压缩过剩生产能力，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可能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阵痛。成长中的中国，规模和总量越大，我们面临的内外矛盾越多，治理起来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比规模超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2010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预测2012-2013年英国年经济增长率为近3%，目前的预测是今年GDP可能出现下降，明年大约也只能增长1%。早先的预测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可以归于英国当局和IMF对财政政策调整不足。

欧元区重债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表现也远远不及预测，原因是大规模的支出削减和税收增加。比如，根据预测，今年葡萄牙GDP将增长1%，事实上，这一数据可能下降3%。